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名人与北大

李羨林署



北京大学出版社

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100 年

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 ——名人与北大

萧超然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萧超然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ISBN 7-301-03506-3

I. 巍… II. 萧… III. 北京大学-名人-生平事迹 IV. K820.7

书 名: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

著作责任者:萧超然

责任编辑:严胜男

标准书号:ISBN 7-301-03506-3/G·420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印者: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625印张 645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40.00元

序

季羨林

计算北大的历史,我认为,可以采用两种算法:一个是从古代的太学算起,到了隋代,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此名未变,而且代代沿袭。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北大所传的正是国子监的衣钵。这样计算,一不牵强,二不附会,毫无倚老卖老之意,而只有实事求是之心。既合情,又合理。倘若采用它,是完全能够讲得通的。

但是,当前流行的而且实行的计算方法,是从以国子监为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算起。我不说这种计算方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实事求是;而且既然大家都已承认,约定俗成,“吾从众”,我也同意这种计算方法,确定北大创办于1898年,至今正值100年,决定庆祝百岁华诞。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许多一流大学比较起来,有100年的历史,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即在中国,北大也决不是老大哥。但是,大学不是人参,不是陈酿,越老越好。大学之所以能够好,能够扬名天下,有另外的原因或者因素,这种因素决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形成的,而是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10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也不算太短,积累因素,从而形成特点或者特性,已经足够用了。

从1898年至1998年这100年,在中国全部历史上只占极小的

比例；但是，在这 100 年内所发生的事情之多、之复杂，社会变动之剧烈，决不是过去任何 100 年所能够比的。只举事件之荦荦大者，就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有袁世凯表演的悲喜剧洪宪称帝；有对中国现当代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有令人民涂炭的军阀混战；有国民党统治；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入侵；有声势浩大的解放战争；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 1957 年的“反右”；有“大跃进”；有随之而来的三年灾害——姑且不讲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有 1966 年爆发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空前浩劫；有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等等，等等。这 100 年的后一半大学几乎全是在会议和“运动”中度过的。

所有这一些历史事件，北大都经历过，中国历史稍长的大学也都经历过。“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的经历大同而小异。“大同”指共性，“小异”指个性。超出共性与个性之上的事实是：在众多的大学中，北大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北大是中国大学的排头兵，是它们的代表，这是国际和国内所共同承认的，决不是北大人的妄自尊大，而是既成的事实。一个唯物者决不能决不应视而不见的。所以，谈一谈北大的共性，特别是它的特性，就有超出北大范围的普遍的意义。

在讨论共性和特性之前，我想先谈一谈我对大学构成因素的意见。我认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四种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第一个是教师，第二个是图书设备（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第三个是行政管理，第四个是学生素质。前三个是比较固定的，最后一个流动的。

我之所以把教师列为第一位，是有用意的，也是有根据的。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

系身价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十年浩劫前，一位文教界的领导人说过一句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在浩劫中受到严厉批判，在当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下，这是并不奇怪的。但印度古语说：“真理毕竟会胜利的”(Satyam eva jayate)，这一个朴素的真理也胜利了：大学的台柱毕竟是教师，特别是名教师，名人。其他三个因素，特别是学生这个因素，也都是重要的，用不着详细论述。

作为中国众大学的排头兵的北京大学，100年以来，其教师的情况怎样呢？其学生情况又是怎样呢？在过去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十分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北大的师生，在所有的拮据邪恶、伸张正义的运动中，无不站在最前列，发出第一声反抗的狮子吼，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前进，为世界人民的前进，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北大师生中，不知出现了多少烈士，不知出现了多少可以被鲁迅称之为“脊梁”的杰出人物。这有史可查，有案可稽，决非北大人的“一家之言”。中国人民实在应该为有北大这样的学府而感到极大的骄傲。

几年以前，北大的有关单位曾举行过多次座谈会，讨论什么是北大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同对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我对这个也曾仔细思考过，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讨论北大的优良传统，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因为北大的老师和学生都是知识分子。几千年以来，知识分子——也就相当于古代的“士”——一经出现，立即把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压在自己肩上。不管知识分子有多少缺点，他们有这个传承的责任，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世界各国都有知识分子。既然同称知识分子，当然有其共性。但是，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个事实也是无法否定的。

专就北大而论，在过去的100年内，所有的拮据邪恶、伸张正义

的大举动，北大总都是站在前排。这就是最具体不过的，最明显不过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连一般人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据我看，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仍在振兴中华，爱我国家。其他众多的运动，无不作如是观。

同爱国主义有区别但又有某一些联系的，是古代常讲的“气节”，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硬骨头”，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在别文章中举过祢衡和章太炎的例子。现代的闻一多等是更具体更鲜明的例子。

如果想再列举北大的优良传统，当然还能够举出一些条来，比如兼容并包的精神，治学谨严的学风，等等。但是，我觉得，提纲挈领，以上两条也就够了，再举多了反而会主次不分，头绪紊乱，不能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我把爱国主义和硬骨头的气节列为北大的优良传统，决不是想说，别的大学不讲爱国主义，不讲刚正不阿的骨气。否，否，决不是这样。同在一个中国，同样经历了 100 年，别的大学有这样的传统，也并不稀奇，这是个共性问题，北大决不能独占，也决不想独占。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北大，是讲个性问题。而北大在这方面确又表现很突出，很鲜明，很淋漓尽致，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我讲北大的青老知识分子，也就是教师和学生，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决不是想说：社会上其他阶级或社会群体，比如工、农、商等等，不讲这个优良传统。否，否，决不是这样。中国各社会群体提倡的也都是这样的优良传统。否则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的岳庙和文天祥祠堂应该怎样去解释呢？而包公和海瑞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膜拜，又怎样去解释呢？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北大，讲的是北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一般说来，表现优良传统主要在人。专就北大而论，人共有两部分：一个是教师，包括一部分职工；一个是学生。前者比较固定，而后

者则流动性极大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学生每隔几年就要换班。因此,表现北大传统的主要是教师。在过去 100 年内,在北大担任过或者还正在担任着教师的人,无虑数万。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有出类拔萃者,也有默默无闻者,而前者又只能是少数。可是人数虽少而能量却大。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靠他们来传承,北大的名声主要靠他们来外扬。有如夜空中的群星,有璀璨光耀者,有微如烛光者。我们现在称之为“星辰”者就是群星中光耀照人者。“辰”的含义颇多,《左传》把日、月、星三光都称之为“辰”。大家不必拘泥于一解,只了解它的一般含义就行了。

现在北大要纪念百年诞辰,这实在是学坛盛事,有深远意义。而且其意义还不限于北大一校,这应当是大家的共识。北大一些同志妙想天开,异军突起,想以北大过去 100 年来的名人为线索,来表现北大的优良传统,来表现北大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立即得到了校内许多人的支持。主编萧超然教授垂青不佞,命我作序。以我之鄙陋,何敢担此重任。但又念我在北大已 50 多年,占北大百年校史之一半有余。对北大的过去和现在是有所了解的,当仁不让,义不容辞,所以就在惶恐赧棘之中,写成此序,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北大优良传统的看法,切盼全校以及校外的贤达指正。

〔作者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目 录

序.....	季羨林(1)
孙家鼐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	周承恩(1)
第一任校长——严复	张寄谦(12)
没有到任的校长——章士钊	王世儒(28)
博大坚贞 化腐为奇	
——蔡元培与北大	梁 柱 赵存生(35)
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	曲士培(55)
开一代新风的文化先驱——胡适	欧阳哲生(71)
唯一的名誉校长——马寅初	晏智杰 朱正直(87)
江隆基与北京大学	王学珍(98)
不激不随 至博至大	
——汤用彤与北大.....	汤一介 孙尚扬(113)
科教树人 一代宗师	
——周培源与北大.....	盛森芝(127)
生死与共话沧桑	
——魏建功与北大.....	魏 至(142)
风雨力耕廿五年	
——傅鹰在燕园.....	杨培增(158)
我在北大跟王竹溪先生做学生.....	王正行(170)
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冯定.....	谢 龙(177)
“我总是走自己的路”	
——翦伯赞与北大.....	张传玺(189)

康有为梁启超与京师大学堂的筹建·····	王晓秋(204)
文科学长“五四”旗帜——陈独秀·····	陈哲夫(214)
偷取天火救中华	
——李大钊与北大·····	萧超然(232)
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	
——毛泽东与北大·····	萧超然(247)
周恩来对北大的关怀·····	王效挺(262)
“小平您好” 北大人的心声·····	魏国英(275)
北大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邓中夏·····	萧超然(283)
民主运动的斗士 进步教授的旗帜	
——许德珩在北大·····	沙健孙(300)
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足迹	
——邵飘萍与北大·····	陆彬良(317)
惓惓爱国心 殷殷报国情	
——钱端升在北大·····	赵宝煦(335)
从课堂走向斗争第一线	
——范长江在北大·····	方 蒙(349)
“民族魂”的精神光辉永照	
——鲁迅与北大 ·····	孙玉石(356)
学苑元戎 挂冠教授——马叙伦·····	金安平(377)
北大“五马”第一人——马裕藻·····	孔 冈 杨康善(384)
茅盾在北大·····	乐黛云(391)
《新潮》主将 “五四”指挥——傅斯年·····	欧阳哲生(397)
开创古史研究新风的前驱——顾颉刚·····	顾 潮(411)
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	蔡美彪(425)
诗人·红学家·教授——俞平伯·····	商金林(436)

与时俱进的语言学大师——罗常培·····	周定一(451)
接受“五四”洗礼 坚持“五四”精神	
——朱自清与北大·····	朱乔森(466)
最早诠释“五四”精神的《新潮》闯将——罗家伦·····	罗久芳(480)
斗士·作家·教授——林语堂·····	严家炎 王兆胜(493)
从北大到台大	
——记台静农·····	林中明(505)
红楼旁听启征程 业绩风范照后人	
——曹靖华与北大·····	岳凤麟(518)
诗人·学者·翻译家——冯至·····	严宝瑜(536)
文学史家 楚辞专家——游国恩·····	褚斌杰(549)
旁听生·作家·教授——沈从文·····	温儒敏 李宪瑜(555)
怀念朱光潜先生·····	李赋宁(563)
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	阴法鲁 肖良琼(567)
北大阿拉伯语言文学学科的创始人——马坚·····	仲跻昆(580)
国子因缘 名山事业	
——王力与北大·····	唐作藩(591)
北大的智慧星——吴组缃·····	唐 沅(611)
翁文灏对北大地质学学科的关注与支持·····	于 洸(619)
丁文江章鸿钊与北大地质学学科的建设·····	于 洸(627)
北大地质学学科的奠基人——李四光·····	于 洸(635)
孙云铸与北大地质学系的发展·····	于 洸(646)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	吕遵谔(655)
深切怀念我的北大老师曾昭抡教授·····	唐敦庆(668)
北大生物学学科的拓荒者——张景钺·····	陈阅增(673)
北大物理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饶毓泰·····	沈克琦(677)
北大植物生态学学科的开拓者——李继侗·····	杨 澄(688)

北大磁学学科的奠基人——叶企孙…………… 钟文定(694)

不尽的怀念

——记邓稼先…………… 王世堂(706)

“文化中国”的象征

——梁漱溟与北大…………… 王宗昱(713)

生命不熄 薪火承传

——冯友兰与北大…………… 李中华(724)

重建中国哲学的机缘

——熊十力与北大…………… 王守常(741)

院系调整后中国第一位哲学系系主任——金岳霖…… 汪子嵩(749)

著译交辉 中西互融

——贺麟与北大…………… 张祥龙(754)

漫步于未名湖畔的美学老人——宗白华…………… 彭 锋(763)

跋…………… 萧超然(771)

孙家鼐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

周承恩

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但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是谁,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实际上,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创办人主要是孙家鼐,后一阶段的创办人主要是张百熙,他们都是清朝末年的重臣和名人。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科举得一甲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和内阁大学士等职。他曾与翁同龢一起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政治上接近帝党,但与后党也有某些联系。他的旧学很有根底,又注意研究新学,关心时务,思想比较开明,倾向维新变法,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仍保持一定距离。光绪初年,陈宝琛上疏朝廷,请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顽固派诸大臣竭力反对,而孙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则大力支持,终于得到朝廷的批准。孙家鼐同情维新派的变法革新主张,但他对康有为著作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内容却不以为然,奏请清廷予以删除。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废科举、兴学校、设报馆、编新书等变法主张,光绪帝交诸大臣讨论。顽固守旧派纷纷反对。孙家鼐在上疏中提出:“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听言不厌求详,然执两用中,精择审处,尤赖圣知。”^①就是说,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应由皇帝全面考虑,作出决策。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维新派的。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

书,收集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批评时政,鼓吹变法维新。1896年初,顽固派攻击他们“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奏请查封。但在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一些帝党又奏请解禁。光绪皇帝决定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并派孙家鼐兼任官书局督办。

孙家鼐受任后,拟定官书局章程7条,规定局内设藏书楼、刊书处及游艺院等机构,聘请中外学者编译出版中外书刊,购置收藏科学仪器,供“留心时事,讲求学问者”阅览利用。此外,他还提议在官书局中设学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为教习,凡京官年富力强者,子弟之资性聪颖安详端正者,如愿学语言文学及制造诸法,听其各出学资,入馆肄习。”^②由于缺乏经费,设学堂一事当时未能实现,但这被认为是京师设学堂的最初动议。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上疏皇帝,奏请“推广学校”,并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迅将此议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复。总理衙门奏复说:“京师建立大学堂一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飭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于是此事又交给官书局督办孙家鼐议处。孙家鼐很快即上疏清廷,明确表示赞成设立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开办大学堂的6条意见。其中关于“立学宗旨”一条,孙家鼐认为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③。这与康、梁等主张的“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意见虽然还有距离,但同那些顽固守旧者排斥一切西学的意见更有明显的不同。关于学科设置,孙家鼐建议大学堂应分立10科:“一曰天学科,算学附焉;二曰地学科,矿学附焉;三曰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学附焉;六曰武学科,水师附焉;七曰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八曰工学科,制造格致各学附焉;九曰商学科,轮船铁路电报附焉;十曰医学科,地产植物各化学附焉。”^④这差不多包括了后来所谓的文、法、理、工、医、农以至军事等各个基础学科。可见在孙家鼐的心目中,京师大学堂应该办成一所

包括中西、贯通古今、规模宏大、学科齐全的真正综合性大学。此外，他还提出建造学堂、访求教习、慎选生徒、推广出身等项建议。孙家鼐的上述6条意见，可以说是创办京师大学堂最早的具体设想。这些意见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赞同，但顽固派却以经费困难为藉口，主张此事缓办。于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一事又被搁置下来。

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日趋高涨。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⑤。而顽固派仍然敷衍拖延，不予执行。6月26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出上谕，严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迅速复奏，毋稍迟延”。这样，他们才不得不请来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就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1898年7月4日，光绪皇帝专门下诏，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同时，决定将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统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

孙家鼐受命为管学大臣后，即以很大精力投入大学堂筹办事宜。他建议大学堂设总教习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并举荐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同治年间进士，曾代表清廷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比较了解外国情况，中学也有很深造诣。丁韪良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1850年来华，先在宁波传教，后任美国驻华使馆译员，还长期担任过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是外国人中著名的中国通。孙家鼐原拟推荐刑部主事张元济（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为大学堂总办，张因对孙的某些教育主张持有不同意见，推辞不就，孙家鼐遂改荐他人。此外，还任命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聘任刘可毅、骆成驥等为教习。大学堂的办学经费，由户部指定以中国政府在华俄道胜银行的一笔存款的利息支付。光绪皇

帝还派庆亲王奕劻和礼部尚书许应骙负责为大学堂建造校舍。在新校舍建成前,先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略加扩充,作为大学堂临时校舍。

正当孙家鼐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之时,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变法维新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有筹办中的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并由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但原定的大学堂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学堂规模也较原来的设想大为缩小。除附设的中小学外,大学堂仅设仕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之京曹入院学习。“京曹守旧,耻入学,赴者绝少。”^⑥大学堂原定招生500人,到这年12月开学时^⑦,“学生不足百人,讲舍不足百间”。课程仅设诗、书、礼、易四堂,春秋二堂。学堂“竟竞以圣经礼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⑧。到次年,学生才增加到近200人。原有各堂改名为立本、求志、敦行、守约,另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上午学经史,下午学科学。学生们对这种封建书院式的教学很不满意,连当时的总教习许景澄也批评孙家鼐说:“公办学堂,太偏于理学。”实际上这主要是屈从于当时顽固派的压力,并非孙家鼐的本意。

1900年春,孙家鼐为反对西太后阴谋废黜光绪帝位愤而辞职,由许景澄代理管学大臣职务。这年夏天,义和团进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均告假四散。道胜银行被毁坏,大学堂无处支银,经费完全断绝。许景澄只得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西太后便下令停办大学堂。不久,许景澄因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的政策,也被西太后处死。

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这是京师大学堂的初创阶段。在此期间,由于戊戌政变的影响,孙家鼐原来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一套设想未能完全实现。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挟光绪帝匆忙出逃,最后到达西安。次年9月,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人民对腐朽反动的清朝统治者更加怨恨,反

清革命势力日益发展，清朝统治者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在清政府官员中，“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西太后也声称要“变法维新”，准许各省举办学堂，宣布要逐步废除科举制度。1902年1月10日，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大学堂复校事宜。

张百熙，字野秋，湖南长沙人，同治年间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帝侍读，自然倾向帝党。他既有深厚的中学根底，又对西学颇有研究，思想开明，赞成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曾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维新派。甲午战争时，他疏刻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以致“贻误兵机”，导致中国失败。又与侍讲学士陆宝忠等联合上奏，揭发“枢臣朋比误国十大罪”。他还上疏批评为筹办西太后诞辰而大肆铺张浪费，要求罢免“承办典礼者”。他这种不畏权贵，大胆直言的人品，“为时论所推重”，在进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声望。戊戌政变后，张百熙以“滥举康有为”，受革职留任处分。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下诏求言”，张百熙即“抗疏陈大计”，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积极提倡变法自强。迫于当时的形势，西太后表示赞同这些意见，并重新起用张百熙。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

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后，很想有一番作为，决心要把京师大学堂办好。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从前所办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未详备，……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材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⑧这就是说，他不想因仍旧制，在原来的基础上恢复京师大学堂，而是要开拓改革，重新设计，建立一所法制详备，规模宏大的新的京师大学堂。

为了借鉴西方的办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张百熙曾通过清朝出使